

大學生死亡焦慮的內涵建構與現況調查之研究

蔡明昌*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中心

有鑑於國內目前尚缺乏建構自本土化觀點的死亡焦慮量表，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以國內大學生為對象，透過實地訪談的方式，建構其死亡焦慮的內涵，藉以發展出適用於我國大學生的死亡焦慮量表，並以此為工具調查我國大學生死亡焦慮的現況。透過對大學生進行的實地訪談，研究者歸納出大學生死亡焦慮內涵的六大層面，並據此發展為「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本研究抽取 511 位大學生進行調查，結果顯示國內大學生的死亡焦慮在整體表現上為中等程度 ($M = 3.16$, Likert 式五點量表)。但在「關係喪失」及「無助與疼痛」二項分量表的得分偏高；另外，本研究亦發現國內大學生的死亡焦慮具有性別差異，女性較男性有更高程度的死亡焦慮之趨勢；研究者對於上述結果進行討論後，提出後續研究的具體建議。

關鍵詞：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

壹、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無論是在學術研究或教學實務上，死亡焦慮一直是生死教育領域的一個重要變項，從生死教育的相關文獻觀之，包括較早期的 Feifel (1965)、Knott (1979)、Leviton (1977)，至較晚近的 Morgan (1997)、Wass (2004) 等人，在其著作中均提及了生死教育對於處理學生死亡焦慮的重要性。綜觀國內歷年來的生死學及生死教育領域之相關研究，有關死亡焦慮的測量，其研究工具有直接翻譯自國外量表的趨勢（諸如吳美如，2005；黃宇達，1997；楊曉惠，2010；劉益廷，2011），其研究結果除了為相關學術領域奠定了相當豐富的實證資料之外，從國際性及跨國性的比較觀點言之，直接翻譯國外量表在國內進行使

* 通訊作者：蔡明昌，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 號，email: mctsai@mail.ncyu.edu.tw；05-2263411#2950

用的方式提供了跨國性比較的基礎，也有助於各學術領域的發展。但在考量文化、社會等因素對個體死亡焦慮可能產生的影響性時，適用於國人的死亡焦慮量表之開發，應值得期待。

當前國內死亡焦慮量表的使用有兩個問題亟待深入商榷，首先，從原始量表來看，目前較常用的自陳式死亡焦慮相關測量工具，其因素結構各不相同，雖互有重疊，卻亦有歧異之處，顯示各量表對死亡焦慮構念之見解有所差異，值得進一步分析其內容並加以探究。再者，當前國內相關研究翻譯國外量表時，「預試後進行刪題隨即正式施測」的常見模式，是否適合死亡焦慮翻譯量表的作法，亦有待商榷，因為此方式有可能忽略了我國與西方在社會文化發展上的明顯差異因素。以「死亡焦慮」為例，雖然對死亡產生某種程度的焦慮乃人之常情，無論東、西方皆然，但是在死亡此一概念之下，有哪些令人產生不安的焦慮來源，恐怕就牽涉到傳統文化、社會、宗教信仰、甚至政治、經濟情勢等因素而有所差異了。Tomás-Sábado 與 Gómez-Benito (2005) 即有鑑於西班牙在文化背景上有別於美加地區，因而發展出建構自西班牙本土文化的死亡焦慮量表 (Death Anxiety Inventory, DAI)。

一般而言，在量表發展的標準化過程中，以項目分析的方式進行試題品質的篩選，是一項重要且必要的程序，但其前提應該考量到試題內涵的建構過程是否適切。因此，就死亡焦慮研究的翻譯量表使用而言，僅以「翻譯後以國內樣本進行預試，並進行刪題」的「只刪不增」方式，能否符合真正測得國人死亡焦慮現況？值得商榷，這種以國內樣本施測所得，進行因素分析後所抽取之構念，是否真為國人死亡焦慮之真正構念？其包含的範圍是否完整？同屬於西方文化範疇下的西班牙學者對於發展於北美文化背景下的諸多死亡焦慮相關量表，尚有翻譯使用上的疑義，而與美國分屬於東、西方文化的我國社會對於上述問題，理應更為謹慎。因此，有關死亡焦慮量表的使用，應有以本土化的觀點對死亡焦慮之構念進行再檢視，甚至重新建構之必要。

基於上述，本研究所欲發展的，並非一份與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死亡焦慮量表，而是想藉由傳統文化生死觀點探討，找出若干可能影響大學生的死亡焦慮之文化特色，以使量表的內涵與架構，更為適用於國內之樣本。因此，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國內大學生為對象，透過實地訪談的方式，建構其死亡焦慮的內涵及構念，藉以發展出適用於我國大學生的死亡焦慮量表，並以此工具對國內大學生進行調查，以初步瞭解我國大學生死亡焦慮的現況。

二、重要文獻評述

(一) 死亡焦慮的傳統文化觀點

由於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係希望能發展出建構自本土化觀點的死亡焦慮內涵，因

此，有必要先由傳統觀點的角度，對於生死焦慮的相關議題進行概覽。研究者雖未發現傳統文化中直接討論死亡焦慮的文獻，但從討論生死的相關文獻中，亦有若干啟示。以儒家的觀點而言，似乎有避談生死議題的傾向，其中以《論語先進篇》中，子路以「鬼神」及「死」兩個問題問孔子，而得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以及《論語里仁篇》中的「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說法，最具代表性。此種濃厚著重現世而輕忽死亡的觀點，影響國人甚鉅。釋慧開（2004）則認為上述「未知生，焉知死？」的說法，不能據以為論斷孔子避談或拒談生死大事的佐證，而是不能離生而論死的一種警語，此觀點可與傅偉勳（1993）認為以儒家思想為主的中國思想文化傳統，雖未完全的避談生死，但確實較著重在現世的問題的討論，較不具有強烈的宗教超越性的看法相呼應。蔡明昌、歐慧敏（2008）則指出儒家在觀念上雖然保持著理智審慎的態度，但在實際作法上卻又繼承了商周以來尊鬼敬天的習俗，二者間其實並不協調。只是此種不協調的情況，卻仍存在於國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宋文里、李亦園，1988；蔡明昌，2007）。對於死亡一事所衍生出來的未知、痛苦、斷滅等因素，一句「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能否安撫人心的焦慮？而「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說法，能否使人著重於眼下的人倫國事，而無視死亡的必然？實值得懷疑與探究。

相較於儒家的避談生死，另一個對國人思想有重大影響的道家觀點，將生與死視為一種自然界的現象，主張「不因生而樂、不以死而哀」的豁然態度來面對之。在《莊子知北遊》中，所謂「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即是抱持著自然的觀點，經將生命的形成與消逝視為氣的聚與散。而在《莊子至樂篇》中，莊子在其妻死亡時鼓盆而歌的情節，以及其對惠子的質疑所提出的「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的說法，表達出人之生由芒芴之間的氣聚而來，死則為氣散而歸返自然的態度，則是另一種傳統思想的典型。

不管是上述儒家的「著重現世而避談生死」抑或是道家的「豁達態度而看淡生死」，對一般人而言，無論從生物的求生本能觀點來看，或是從具有七情六慾的有情眾生角度觀之，恐怕都難以達到如此對死亡無所焦慮的境界。更遑論佛教東傳之後，其地獄觀與秦漢以降的「泰山」、「黃泉」、「幽都」概念結合，形成本土化的「十殿閻王」之說對民間死亡觀的影響（宋光宇，1983），以及佛經《毗奈耶》所提到的「不思議業力，雖遠必相遷，果報成熟時，求避終難脫」之「業」的概念，與輪迴轉世之說結合成的「依業輪迴」法則，增加了死後審判的壓力，都可能造成個體某種程度的死亡焦慮。

從另一個極端的角度來看，南北朝時代范縝提出「神滅論」的觀點，認為「神即形也，

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堅稱形體與精神是一體兩面，二者不能分開，因此，在人死亡、形體腐化之後，精神自然隨之消散（潘富恩，1996）。此一觀點的影響力在受到佛、道等宗教深遠影響的中國文化中，獨樹一格地開展，影響亦頗為深遠，直至民國初年，影響近代國人思想甚鉅的胡適，在其「不朽：我的宗教」一文中，尚引用范疇的觀點，來做為批判神不滅論觀點的論證，可見此一神形俱滅的觀點在探討國人面對死亡的議題時，應有其不可忽略的重要性。

綜而觀之，傳統文化中，儒、道二家的避談生死與豁然面對生死觀點，牽涉到的實為關於存在的終極課題，表面上，儒家主張由人倫國事的關注，進而達成天人合一的境界，以此來消解死亡所可能造成滅絕的憂慮。而道家則主張以自然法則的觀點來面對死亡，達成「生有何歡？死有何懼？」的目標。但其所蘊含的內在意義，恐怕是更彰顯出「死亡」對生為有機個體的人類而言，是威脅其生存與存在的焦慮之源！至於從民間信仰或佛、道宗教觀點出發的地獄、業力、輪迴等觀念，對於「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的芸芸眾生而言，更是一種未知與等待審判的壓力。而傳統文化中神滅論的觀點，或許其在降低人們關於審判、輪迴方面的焦慮有其幫助，但其所引發出的生命意義與存在問題、以及因為否認死後世界，而引發的死亡將造成關係永久喪失的問題，亦值得重視。

如進一步以東、西方宗教的生死觀點比較的角度來看，傅偉勳（1993）認為西方基督宗教在性質上屬於「他力宗教」，亦即以「拯救」或「救濟」的觀點來處理生死問題，而屬於東方宗教的佛教則為自力宗教，強調的是「解脫」的概念。因此，同樣面對死後世界的審判壓力，基督宗教提出「因信得救」的懺悔及救贖的主張（段德智，1994），東方文化中的佛教，則以業報輪迴到涅槃解脫的進路為主軸，強調的是內省與智慧的洞見。因此，受自力宗教影響較深的國人，相較於以他力宗教為主軸的基督宗教文化，是否因此在生死問題的思考上較強調自我？是否在面對死後審判的壓力時，傾向以自身作為的業報因果觀為思考方向，而非信仰的虔誠與否？頗值得深思與探究。

（二）焦慮及死亡焦慮的理論觀點

一般而言，焦慮大抵涵蓋於心理學的研究範疇之內，心理學有關焦慮的相關研究及文獻中，對焦慮此一概念的論述頗為深入及複雜，歷年來亦累積了相當數量的文獻，研究者認為最值得密切關注，且與本研究有重要關係者為「狀態 - 特質焦慮（state-trait anxiety）」的概念，此概念首先於 1958 年由 Cattell 與 Scheier 提出，利用因素分析法發現焦慮包含「特質焦慮」及「狀態焦慮」兩種因素，而 Spielberger（1966）進一步在《焦慮行為》（Anxiety and Behavior）一書中，詳細地闡述了狀態 - 特質焦慮理論。

所謂「狀態焦慮」（state anxiety）是指個人在特殊情境及刺激下所感受到的緊張與憂

慮，是由外在環境所引起的，屬於一種「暫時性的情緒狀態」(transitory emotional state)，隨著時間改變其強度和波動性，當緊張和不安的情緒伴隨著自主神經系統而引發，一旦個體認定某一情境具有威脅時，便會經歷此種焦慮，若引發焦慮的情境消失，焦慮情緒也跟著消失。而「特質焦慮」(trait anxiety)是一種習得的行為傾向，也是個人內在「穩定性的人格特質」(stable personality trait)部分，具有持久性、長期性的個別差異，是一種相對穩定、持久的人格特質，這可能是幼年生活環境因素逐漸型塑而成的，是個人特有的情緒傾向 (Cross & Huberty, 1993)。

1991年，Endler、Parker、Bagby與Cox針對「狀態-特質焦慮」的概念，發展出一份多層面焦慮量表(即Endler Multidimension Anxiety Scale, EMAS)，進一步將「特質焦慮」區分為社會評價(social evaluation)、身體危險(physical danger)、模糊性(ambiguous)、每日常規(daily routines)等四項層面，並表明此一特質焦慮尚可加入其他尚未確定(other-undetermined)的層面(諸如自我揭露、分離焦慮等)。而「狀態焦慮」則區分為認知(cognition)及自動化(autonomy)兩個層面 (Endler, Parker, Bagby, & Cox, 1991; Endler & Kocovski, 2001)。由EMAS的基本結構來看，焦慮是一個頗為複雜的概念，而焦慮情緒的測量工具，也不應該只是一項表達焦慮與否的高低總分而已。

關於死亡焦慮的探討，雖然並非心理學領域的主要議題，然而，包括Rogers (1959, 1980)、Maslow (1968)等人本心理學派的自我實現理論(self-realization theory)，Kelly (1955)的個人建構理論(personal construct theory)，以及否認與正向錯覺理論(諸如Becker (1973)、Taylor和Brown (1988)等)，均相當程度地討論到有關「焦慮」的議題，其內容有助於對死亡焦慮進行延伸性之詮釋。

首先，以人本理念為主軸的自我實現理論，著重在自我實現的追求上，Maslow (1968)認為一個自我實現的人，具有接受自我、低焦慮(包括對死亡有較低恐懼)等特徵。而Rogers (1959)在其理論觀點中，提到了個體對他人的正向關注(positive regard)之需求，有時反而會形成造成焦慮來源的價值條件(conditions of worth)，太過執著於價值條件的結果(因為太重視他人的正向關注)，反而會使人忽略自己本身的需求，因而失去自我。從生死學的角度觀之，「活著(being alive)」就如同一種普世的價值條件，死亡焦慮的源頭，即是此價值條件與人的必死性相互衝突的結果。然而，Rogers (1980)在其後來的著作中直接論及死亡，認為當一個人能夠在接受死亡的必然性的前提下，具有維持自尊的能力，就能夠減緩此價值條件所造成的焦慮。由此可知，個體的死亡焦慮與其自我實現的情況，應該具有相當程度的負向關係。

Becker (1973)認為所有的焦慮都根植於個體對死亡的認知，其影響之廣泛，從個人

到文化的各層面都可以發現。他以佛洛伊德學派的觀點為脈絡，認為個體在內外環境的刺激下，會引發出一種防衛機轉，來否認無可避免卻難以接受的必死性（mortality），然而，與 Freud 對死亡的解釋相反的是，Becker 認為死亡是所有人類焦慮產生的本源，而 Freud 則傾向將死亡焦慮視為僅是一種本能衝突的「表象」或「推託之詞」。因此，所謂的高死亡焦慮，即被解釋為是這些以否認為主的防衛機轉崩解（breakdown）的結果；相反地，所謂的正常の本質（the essence of normality）即是一種不受自己的「謊言」影響，對死亡加以否認的能力。

除了 Becker 的論述之外，以否認及錯覺來解釋死亡焦慮的，尚包括 Taylor 與 Brown（1988）所提出的與 Becker 觀點類似，卻稍有不同的論點，Taylor 與 Brown 認為，對於死亡，個體可能會承認其不可避免，而不是如同前述地加以否認，但是，取而代之的則是一種「雖然死亡無可避免，但卻為時尚早」的錯覺，或者「想像自己的人生計畫（life project）以即將完成，因此不怕死亡到來」的方式來減緩死亡焦慮。Tomer（1994）綜合上述的兩種論點，認為使用防衛機轉來克服死亡焦慮個體，其潛意識中的死亡焦慮仍高，相對而言，正向錯覺則牽涉到一種連個體自己都信以為真的「信念」（beliefs），係以連個體都信以為真的錯覺來處理死亡焦慮的問題，與以自我安慰的防衛機轉為主的否認，在本質上有所差異。

在個人建構理論方面，Kelly（1955）強調一個人會對於事件進行建構，以便能在未來遭遇相類似的事件時預作準備（anticipate）。在其著作中，當以威脅（threat）作為建構的範例時，多次使用死亡一詞，Kelly（1955）認為威脅的概念，係個體意識到自己的核心結構（core structure）即將有所轉變，而死亡相較於個體當前（活著）的核心結構而言，是一個不相容的核心結構，故威脅因而產生。除了「威脅」的概念之外，Kelly（1955）亦將「焦慮」的概念界定為「當個體認知到其所遭遇之事件超出自己架構系統的範圍」之時，據此，死亡既然是個體活著時無法實際體驗的事件，在這種「超出既有架構」及「無法體驗」的情況下，死亡焦慮的產生實在所難免。

經由上述心理學的取向針對焦慮及死亡焦慮的理論觀點所進行的探討，可以發現，就狀態-特質焦慮理論的觀點而言，焦慮是一個頗為複雜的概念，因此，由焦慮測量工具所測出的焦慮情況之解釋，也不應該只是表達焦慮總分高低而已，應就所描述的焦慮情況內容來加以分析。相較於其他種類的焦慮，死亡焦慮牽涉到人類對於存在與否的基本處境與思維，因此，從存在色彩相當濃厚的人本心理學出發的學理探討，對於人類焦慮及死亡焦慮的本質，能有較深入之理解，Rogers 將死亡焦慮的源頭指向「活著」的價值條件與人的必死性相互衝突的結果，但也指出自我實現的程度能夠減緩此價值條件所造成的死亡焦慮的可能性。Kelly 由個人建構的觀點出發，認為死亡的「超出既有架構」及「無法體驗」

的兩大特性，是個體死亡焦慮產生的源由。Becker 提出否認必死性的防衛機轉崩解，將引發個體死亡焦慮的說法，則與 Taylor 與 Brown 所提出的對死亡之正向錯覺，形成一個類似但本質並不相同的觀點。這些觀點指出了個體對死亡產生焦慮的可能機制，雖無定論，但這些觀點對於本研究死亡焦慮構念的探討，具有相當程度的重要性。

（三）死亡焦慮相關量表內涵與研究

Templer (1970) 的死亡焦慮量表 (DAS) 是一份包含 15 個題項的量表，自其出版之後，經過五次的修訂，當前坊間所見的為修訂後之版本 (Revised Death Anxiety Scale, RDAS)，題數為 25 題 (Thorson & Powell, 1994)。該量表根據 Thorson & Powell 於 1988 年的研究，歸納出 (1)「害怕不確定與喪失」，(2)「害怕伴隨著死亡的疼痛」，(3)「遺體處置的擔憂」，(4)「害怕無助感與喪失控制」，(5)「擔憂來生」，(6)「害怕遺體腐爛」，及 (7)「擔心某人死亡而使事情不知所措」等七項因素，但卻與其在晚近的研究中 (Thorson & Powell, 1994) 的因素結構有頗大的差別，其因素結構應有進一步檢驗之必要。

在 Lester (1994) 的修訂版柯 - 列氏死亡及瀕死恐懼量表 (Revised Collett - Lester Fear of Death and Dying Scale, RCLS) 方面，該量表之原始版本於 1969 年提出，基於計分不易 (原始量表之評分範圍為 +3 至 -3，由受試者自行填入數字)，以及各分量表題項數目不均等二種因素，Lester 於 1994 年提出修訂版本，將每個分量表的題項數均等為 8 個，並將原來之填答方式，改為五點量表之形式。該量表共 32 題，其四項因素分別為 (1)「你自己的死亡」，(2)「你自己的瀕死」，(3)「他人的死亡」，及 (4)「他人的瀕死」。雖然其再測信度介於 .79 至 .86 之間， α 係數亦介於 .72 至 .91 之間，然而，由於其樣本數偏少 (分別為 27 人及 73 人)，其數據之可信度仍有待商榷。

Hoelter (1979) 的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 (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 MFODS) 共包含 8 項分量表，分別為 (1)「瀕死過程」，(2)「死者」，(3)「屍體被毀 (如解剖、火化)」，(4)「重要他人死亡」，(5)「未知」，(6)「誤判死亡 (未死卻被判定為已死)」，(7)「死後屍體腐爛」，及 (8)「夭折 (premature death)」。該量表在信度的表現方面，8 項分量表的 α 係數介於 .65 至 .82 之間 (Hoelter, 1979)，再測信度經 Neimeyer 與 Moore (1994) 以 106 位大學生施測的結果，介於 .61 至 .81 之間。

Wong、Reker 與 Gesser (1994) 的修訂版死亡態度剖面圖 (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DAP-R) 係針對原始版本的死亡態度剖面圖 (DAP) 修訂而來。該量表並非專為死亡焦慮的測量所設計，但由於死亡態度本身為多元且正、負向並陳的觀點，因此死亡焦慮係為死亡態度範疇中的一部份。原始版本的 DAP 由 Gesser, Wong 及 Reker (1987) 發

展而成，包括了（1）死亡／瀕死恐懼，（2）趨近接受，（3）逃離接受，及（4）中性接受等四項層面，共 21 個題項。1994 年，Wong、Reker 與 Gesser 三位學者重新檢視此量表時，認為在同樣為對死亡的負面態度之中，可區分為恐懼與逃避兩種，而原量表內容中顯然未涵蓋「逃避」層面的題項，因而加以修訂之，除了加入「死亡逃避」此一因素層面之外，原來「死亡／瀕死恐懼」層面中的題項作了修訂與淘汰，並將層面名稱修訂為「死亡恐懼」，因此，初步修訂的 DAP-R 共包含 5 個層面，36 個題項。該 36 個題項經因素分析後淘汰負荷量較低的 4 個題項，其餘 32 個題項，其因素分析所得之架構與原架構相符，五項因素共可解釋總變異量的 66.2%，顯示其建構效度頗佳。至於其信度方面，各分量表之 α 係數介於 .65 至 .97 之間，再測信度則介於 .61 至 .95 之間，顯示其亦有可接受之信度表現。

Tomás-Sábado 與 Gómez-Benito (2005) 的死亡焦慮量表 (Death Anxiety Inventory, DAI)，則是有鑑於死亡焦慮的研究大多進行於英語系國家，因而發展的建構自西班牙本土文化的死亡焦慮測量工具，該量表共有 20 題，有「對／錯」選項以及六點 Likert 量表兩種量表形式。包含五個分量表：分別為（1）「外在的一般死亡焦慮」，（2）「意義與死亡接受」，（3）「對死亡的思索」，（4）「死後世界」，及（5）「生命的短暫」。在信效度的表現上， α 係數為 .90，間隔四周的再測信度為 .94，在效標關連效度方面，與 Templer (1970) 的死亡焦慮量表相關為 .79，經因素分析後，上述五項因素共可解釋總變異量的 54.6%，顯示其建構效度尚佳。在 Tomás-Sábado、Gómez-Benito 與 Limonero (2005) 的另一項研究中，提出該量表的修訂版本，以 886 位西班牙人為對象所進行的研究結果，刪除了 3 個題項(僅剩 17 個題項)， α 係數提升為 .92，但因素分析結果稍有出入，僅抽取出 4 個因素，分別命名為「死亡接受」、「外在的一般死亡焦慮」、「死亡的定局 (Death Finality)」以及「對死亡的思索」，此 4 項因素共可解釋總變異量的 65.8%

綜觀上述死亡焦慮相關量表，「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 (MFODS)」因素結構較為確定，且其信度表現亦佳；「修訂版死亡態度剖面圖 (DAP-R)」的建構效度與信度亦頗佳；「柯-列氏死亡及瀕死恐懼量表 (RCLS)」的信度由於供其考驗之樣本數偏少，其數據之可信度仍有待商榷；而兩份「死亡焦慮量表 (DAS 及 DAI)」均有因素結構不甚確定的問題。另外，由於上述量表對於死亡焦慮相關概念的測量各有所重，因此，其因素架構並不相同。

國內相關研究中，最常翻譯使用的量表即為上述的 DAS 及 RDAS，例如吳美如 (2005) 亦翻譯 DAS 並刪除原量表第 3 題後，以 179 位高中生為對象進行施測，發現其 α 係數為 .699。楊曉惠 (2010) 則翻譯 RDAS，以 106 位老人進行研究，經項目分析刪除 7 個題目，並在因素分析後抽取出「死後所發生的事件」、「未知的死後世界」、「死後失去掌控」及「死亡的過程」四個因素，其總量表 α 係數為 .79。劉益廷 (2011) 亦翻譯 RDAS 以 179

位小學生進行施測，在刪除 2 題後，以因素分析方式抽取出「死亡現象的恐懼」、「死後世界的迷惘」及「死亡身心的痛苦」三大因素。就上述國內相關研究之量表翻譯使用情況來看，其信度多在可接受的程度，但刪題後進行因素分析所抽取之層面，則與原始量表有所差異。

在以國內大學生為對象相關研究方面，黃宇達（1997）翻譯 DAS，以 495 位大學生進行研究，發現大學生的死亡焦慮，並未因性別、居住情形、宗教信仰及健康自評上而有所差異。而許惠淳（2002）亦以 DAS 針對醫學院及非醫學院學生進行比較研究，探討學院別與依附型態是否在死亡焦慮上有交互作用，結果發現安全依附的醫學院學生，在逃避死亡上顯著低於焦慮依附的醫學院學生。楊小薇（2009）以 RDAS 對 106 名大學生進行施測，發現受試大學生對自主權喪失、死後的未知及無助感三方面的焦慮程度較高。綜言之，國內以大學生為對象的死亡焦慮研究尚少，而在研究工具的使用上，亦多翻譯自 Templer 的 DAS 及 RDAS 兩份量表，由研究結果來看，可發現醫學院學生的死亡焦慮與其依附型態有關，但在大學生人口中佔大多數的非醫學院學生，則未發現此種關係；再者，雖然楊小薇（2009）的研究指出了大學生對自主權喪失、死後的未知及無助感三方面的焦慮程度較高，但由於其樣本人數較少，在推論上恐較為受限，有待進一步研究的檢視。

貳、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為實地訪談及問卷調查法，實地訪談的主要目的在於配合文獻探討所得，建構出本土化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的主要架構與內涵；問卷調查法的實施則在於對該量表的各題項及信、效度進行評估。

一、研究對象

（一）實地訪談的對象

為了勾勒出大學生死亡焦慮的來源與內涵，使死亡焦慮量表的內涵能緊密貼近大學生的生活現況，本研究選取 10 位大學生，以死亡焦慮為主題進行開放式之實地訪談，其用意即在於了解大學生對死亡焦慮的普遍情況，並配合文獻探討所得進行死亡焦慮主要層面的建構。在抽樣策略上，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的方式，選取能夠提供充足且多元觀點的樣本進行訪談，根據死亡焦慮相關實證研究及理論基礎，考量的因素包括了宗教信仰與性別二者，就研究者所任教地區的 3 所大學校院中，由教師或學生介紹選取。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第九名與第十名受訪者所提供的資料已有開始重複的趨勢，已無法對先前八名受訪者

所提供資料的暫時性詮釋架構加以擴充，因此停止抽樣，共計有 10 名大學生接受訪談。

(二) 問卷調查的對象

1. 預試樣本

為瞭解「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的題項內涵適切性，並刪除部分不適切之題項，本研究以班級為單位，隨機抽取中部地區 3 所大學校院中的 5 個班級進行施測，共發出 200 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為 18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0.50%。

2. 正式樣本

本研究之正式樣本係先以校為單位，採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 (PPS) 的方式，依序抽取成功大學、中原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朝陽科技大學、大葉大學、元智大學、聯合大學、南華大學、吳鳳科技大學、台東大學共十所學校後，於各校隨機抽取一個班級，以郵寄或親自前往施測的方式進行施測，共計發放 540 份問卷，回收之有效問卷數共計有 511 份，有效問卷回收率為 94.63%。

3. 重測樣本

本研究選取中部地區二所大學 (公、私立各一所) 90 名學生，進行間隔一週的重測，以瞭解其重測信度。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的研究工具有二，包括「實地訪談大綱」、以及本研究所發展的「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說明如下：

(一) 實地訪談大綱

為了解大學生對死亡焦慮的普遍情況，其實地訪談大綱內涵係以死亡焦慮為主題進行設計，其內涵如下：

- (1) 你的宗教信仰是？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信仰？
- (2) 請說說看你人生經驗中，印象最深刻的死亡有關事件。
- (3) 你會擔心死亡的到來嗎？為什麼？
- (4) 關於死亡，哪些事最叫你擔心？
- (5) 你會擔心瀕死前的痛苦嗎？關於此，哪些事最叫你擔心？為什麼？
- (6) 你會擔心毫無預警的死亡 (意外或猝死) 嗎？關於此，哪些事最叫你擔心？為什麼？
- (7) 你擔心死後的遭遇嗎？關於此，哪些事最叫你擔心？為什麼？

(8) 關於死亡這個議題，你還有哪些想法？

上述訪談大綱為研究者針對大學生進行實地訪談時之參考，訪談時係根據當時之情境與受訪者的回應，進行順序及內容的動態調整，並不固定地逐題提出。

(二) 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

1. 量表的基本內涵

此即本研究所發展的正式量表，該量表的基本內涵與結構係由對死亡焦慮的理論基礎、相關量表的檢視與評估、以及實地針對大學生進行訪談三方面歸納所得，將大學生的死亡焦慮量表建構成「自我的喪失」、「未知」、「無助與疼痛」、「來生與審判」、「關係的喪失」、及「屍體及其處理」等六大層面（各層面建構過程敘述於「參、研究結果」之中），並據此架構發展出 60 個題項的預試量表初稿，該初稿經相關學者專家的檢核之後，根據其意見增刪並修訂題項，最後形成預試量表共 62 個題項，其測量形式為 Likert 五點量表。

2. 預試與題項的刪選

在以有效樣本 181 人進行預試之後，進行項目分析，並根據分析結果刪選題項，以建立大學生死亡焦慮正式量表。本研究採用下列五項標準來檢驗題項，以作為刪除題項的依據，包括：(1) 遺漏值檢驗（大於 1%）；(2) 極端組 t 檢定（CR 值小於 3）；(3) 該題目去除後 α 係數是否提高；(4) 與所屬分量表相關係數（未達 .001 之顯著水準）；(5) 主成分分析因素負荷（未達 .40）等五項。其檢驗結果計有第 5，8，18，20，24，47，62 等 7 個題項被刪除，因此，本研究之正式量表共計有 55 題。

三、資料處理

(一) 實地訪談結果的資料處理

在實地訪談的資料處理方面，研究者在事先徵求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進行錄音，在訪談後隨即整理成逐字稿供分析之用。逐字稿在繕打完畢後進行初步的資料分析，亦即進行開放性譯碼（open coding），由逐字稿的文本中尋找相關的意義單元，並賦予這段文字（意義單元）一個適切的概念，在本研究中，每一個被引述概念的逐字稿段落均以括弧標釋出處，例如（受訪者 F 62/65）即表示針對受訪者 F 訪談的逐字稿第 62-65 行。研究者並將這些譯碼後所得的概念請受訪的 10 位學生各自就自己的部分進行檢視，指出不符原意之處，研究者進一步溝通釐清受訪者原意之後，再據此進行調整，並與文獻探討所得加以比較探討，以歸納出當前大學生死亡焦慮的主要來源與內涵，以作為建構死亡焦慮量表之基礎。

(二) 問卷調查結果的資料處理

在預試及正式問卷回收後，本研究即將問卷填答資料編碼並鍵入電腦中，並以 SPSS 套裝統計軟體進行下列處理：

(1) 資料檢誤：首先針對不應出現的數字碼進行問卷複查，並就題目、答案間的邏輯關係加以檢驗，以更正問卷資料，或以廢卷處理之。

(2) t 考驗：在預試問卷回收之後，以此方式檢驗極端組（高低分組）間在每一個題項上的差異情況，以作為刪選題項的依據，並藉以考驗正式樣本的性別差異。

(3) 積差相關：首先，以積差相關檢驗預試量表中各題項與所屬分量表之間的關係，以瞭解其內部一致性，作為刪選題項之標準。再者，用以瞭解正式量表相隔一周施測時，二者間的相關情況，以評估其重測信度。

(4) 信度分析：在預試量表的項目分析過程中，進行信度分析，以瞭解各題項在去除後， α 係數是否提高，以作為刪選題項之標準。另外，亦作為正式量表內部一致性的評估方式。

(5) 主成分分析：在預試量表的項目分析過程中，進行主成分分析，用於瞭解各題項與所屬分量表之間的內部一致性，並以 Stevens (2002) 及 Pett、Lackey 與 Sullivan (2003) 的建議，以因素負荷量 .40 為刪選題項之標準。

(6) 因素分析：在探索性因素分析部分，以主軸法抽取因素，並以斜交方式進行轉軸，用以瞭解所得之該量表因素架構是否符合量表建構之初的理論架構，以檢視其建構效度。在驗證性因素分析部分，則以本量表六大層面的分數作為觀察變項，運用 Amos 統計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瞭解探索性因素分析所抽取的結構模式是否獲得實證資料支持。

(7) 變異數分析：在正式問卷回收後，以相依樣本 ANOVA 考驗各分量表間的差異情形。

參、研究結果

一、死亡焦慮主要層面的建構過程

在死亡焦慮主要層面的建構方面，首先，實地訪談發現，死亡的發生，對大學生而言，是一種「自我的喪失」的威脅：

「我很難想像死了以後完全沒有知覺是什麼情況，都沒有感覺了嗎？那我到哪裡去了？躺在那裡的是我，卻又沒有感覺，我是希望還有靈魂，靈魂還有感覺…」

(A, 16-18)

「死了就死了，什麼都沒了吧，我想，不過要是活得夠久其實也沒關係了，夠本了，(你的夠久是幾歲?)50歲以後吧！不過要是現在就死掉，是有點可惜！」(F, 22-24)

「不會特別去想吧！平時有很多其他的事要做……，如果你現在問我，我應該是會有一些擔心吧，這個世界沒有我其實也沒關係，但是有一點捨不得。」(E, 20-25)

廣義而言，「自我的喪失」之焦慮包括了對失去意識的擔憂、擔心自尊的喪失等內涵，這部分在 Rogers (1980) 的理論觀點中可發現，在實地訪談中亦可發現受訪者多少會表現出傳統道家的豁然態度，表示「沒有關係」，但是，卻也都無可避免地擔心自己沒有知覺，甚至思考自己「到哪裡去了？」。而關於傳統儒家強調重聞道而輕生死的觀念，在訪談中則較少被提及。另外，自我的喪失的威脅，可以進一步擴而大之，包括因夭折而未能實現理想的擔心，在上述訪談中，亦可發現此部分的焦慮，至於現有的死亡焦慮的相關量表內涵中，除了 MFODS 量表中包含有對於夭折 (premature death) 的擔憂的層面及題項之外，較少直接提及「自我的喪失」的焦慮。

另外，「未知」也是大學生對於死亡的一個重要的焦慮來源：

「我不知道耶！大概是天堂吧，有地方去就好了，要是沒有地方去，就不知道要去哪裡，可能變成阿飄了…，我當然不希望這樣子呀！」(B, 45-46)

「不是說要經過隧道嗎？還有一道白光，當然我也不知道這是不是真的，當然書上是這樣寫，好像是有人實際經驗，不過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這樣。……如果是好像說不會很痛苦，很安詳，……，他(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話是這樣講沒錯，但是如果能夠確定，當然就比較好，這樣大家就不怕死了。」(G, 37-41)

Kelly (1955) 的個人建構理論觀點中，即認為死亡因其「超出既有架構」及「無法體驗」的特質，因而使個體產生焦慮。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幾乎都表示無法確定死亡的感覺、死後的感受及遭遇等，上述受訪者 B 希望死後「有地方可以去」否則可能會變成隨處遊蕩的孤魂野鬼 (阿飄)；受訪者 G 雖然接觸過關於瀕死體驗 (near death experience, NDE) 的相關資訊，卻仍不確定而希望能確定死亡的感受，這些說法與 Kelly 的觀點頗為符合。另外，受訪者 G 也提到儒家的「未知生，焉知死」觀點，顯示其在思考生死議題時，受到此一傳統觀點的影響，然而，此一要求大家重視人倫國事而忽略死亡的說法，對年紀尚輕的大學生而言，在實際思考 (甚至面對) 死亡議題時，能否能有安撫焦慮的作用，不無疑問。

在現有的死亡焦慮的相關量表內涵中，RDAS 與 MFODS 均不約而同地列入有關未知的層面，DAP-R 中雖未單獨列為一個層面，但在死亡恐懼的層面中，亦可發現對於未知擔

憂的題項。可知關於死亡的「未知」，可能為造成個體焦慮的原因之一。

再者，大學生對於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亦在實地訪談過程中表現出來，且就其所表達的言語觀之，較上述的自我的喪失及未知層面，在情緒上較為強烈：

「我有一個親戚，他就是癌症過世的，我看到他最後的時間的樣子，整個人瘦的不成樣子，又很痛，也說不出話來……那次我回家一直在想，一直很難忘掉那個樣子，如果那樣子死亡，死亡就很可怕！」(E, 105-116)

「瞬間死亡應該就沒有什麼痛苦了吧？像被雷打到，或者是說吃安眠藥，死就像睡著了一樣，也沒有痛苦，當然我是不會去自殺啦！只是說在睡覺中死掉的這樣的死法還不錯，比較沒有痛苦……但是如果是要死不死的拖很久，那就很悲慘，還不如瞬間就結束。」(J, 92-101)

「如果是好像說不會很痛苦，很安詳，大家都想要沒有（痛苦）……就是說大家都想要安詳，不要太痛，因為在旁邊的人也沒有辦法幫你痛呀！」(G, 42-47)

從現有的死亡焦慮的相關量表內涵觀之，RDAS 將對死亡的痛苦作為一個層面來測量，而 MFODS 中則將此種焦慮置於「瀕死過程的恐懼」層面中，與上述受訪大學生對於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之擔心的情況頗為符合，在確認（或接受）死亡的必然性之後，相對於「存在」與「未知」的哲學性及宗教性問題，「痛苦與否」的問題似乎較為具體，受訪者所表達的情緒似乎也較為強烈，但此一內涵在傳統文化觀點評析過程中並未發現，然而，對於死亡過程可能感受到無助或疼痛的擔憂，應是一種很直接的想法，此一死亡焦慮內涵不宜被忽略！

關於「來生與審判」的問題，也是大學生對於死亡所感到焦慮的事項之一，實地訪談過程中，有若干學生表示並不在意這個問題（包括 E、F 及 J 等），雖然並不完全拒絕相信死後審判或來生的存在，卻認為這對他們而言「應該不是問題」，也幾乎沒有想過這個問題。除此之外，其他受訪大學生則表達對此一議題的想法：

「我看過那座陰廟裡的七爺跟八爺，高高的那個比較可怕，因為廟裡又暗暗的，心理有一點毛毛的，站在他面前很怕他就突然動一下，那我大概會嚇死吧！……他們是抓人去審判的，所以就不要做虧心事吧，……好像是最後一起算的，做一點好事補償回來應該有用吧，比較心安……」(A, 62-69)

「從小大人就教我們說好人會上天堂，壞人下地獄，應該是嚇我們的，要我們不要做壞事，不過我也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我沒作過什麼很大的虧心事，所以應該還好吧！……就多做好事，如果有，那就不會下地獄，如果沒有，反正也沒差，不然，萬一真的有，那就太慢了。」(C, 70-74)

從相關量表的內涵來看，在 RDAS 的七個分量表中，其中一項分量表即包括了有關來生與審判的問題，Tomás-Sábado 與 Gómez-Benito (2005) 所發展的 DAI 中，也有一個「死後世界」的分量表，但其中並未提及死後審判的問題，至於在其他相關量表內涵中則並未發現來生與審判的問題。然而，就傳統文化的角度觀之，來生與審判的問題應是國人面對死亡議題時的一個重要思考方向。傳統佛教中的果報觀點與秦、漢以來的觀念「泰山」、「黃泉」、「幽都」概念結合而成的「十殿閻王」之說，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前提下，可能造成個體某種程度的死亡焦慮。從實地訪談資料的歸納分析中，則可以看到傳統死後受到因果報應的觀點，可能造成受訪者的心理壓力，如從受訪者 C 的回答中，可以發現其雖然以「我沒作什麼『很大的』虧心事，所以應該還好吧！」來回應，但也可以推知他們認為作虧心事可能需要面臨死後審判的信念。這種「似乎存在卻又不甚確認」的情況，亦應是死亡焦慮的因素之一。

深度訪談過程中，受訪者也提及了有關死亡將導致「關係的喪失」方面的若干擔憂，而且從言談之中，感受到了受訪大學生對此一問題的深切焦慮：

「我大概會最擔心我媽吧，她大概會哭得很難過，我們兄妹就是我比較會和她談一些有的沒有的，就是比較親呀，如果我死了，我會最不放心她，她未來的日要怎麼過，……這個我比較擔心。」(D, 96-100)

「我反而會比較擔心我爸媽的身體，雖然他們還算年輕，還不到 60 歲，但是健康的問題好像越來越差了，常常喊這裡怎樣、那裡怎樣的，叫他們去健康檢查也不要……，雖然人都會死，但是希望不要那麼快……。如果換過來，我應該是不會在乎自己活幾歲啦，不過我爸媽大概…不是大概，是絕對不能承受這個事實，一定會崩潰，……我會覺得捨不得。」(I, 83-95)

「如果我現在就死了，除了家人以外，我會捨不得我的這些死黨們，這幾年我們都在一起，做什麼事都在一起，一想到我死了以後，他們還繼續玩，實在有一點不甘心，……，就會想，怎麼是我勒！怎麼這麼衰（倒楣）…」(H, 75-80)

「老實講，我對死後大家是不是能在天國再見面，是有一點點疑問，但是如果可以的話，就不會那麼難過了，……如果都沒有再見面的機會，那就是永遠 bye bye 了，這樣就會很想念…」(G, 52-56)

從 Rogers (1959) 價值條件 (conditions of worth) 觀點而言，「活著 (being alive)」既是普世的價值條件，也是傳統孝道文化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的表現，連身體髮膚都不敢毀傷了，更何況是讓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死亡呢？在我國社會中，為人父母者對於此觀念的灌輸與表達，理當隱約地常存於子女的心中。因此，死亡對

受訪者而言，可能是使其違背此價值條件的威脅。另外，上述來生的信念可能讓個體產生死後審判的壓力，但傳統文化中神滅論的觀點，也可能加劇死亡造成與重要他人關係永久喪失的擔憂（如受訪者 G 所言）。

死亡所意味著是一種失去與世界的聯繫，可能產生一種大家都活著，而我卻死去了的負面情緒。在實地訪談的過程中，有許多大學生透露對於此方面焦慮的訊息，其中以父母為關係喪失的最主要焦慮對象，無論是自己的死亡或父母的死亡，均帶給大學生很大的擔憂，另外，對與同儕友伴聯繫消失的關切，亦可發現於對大學生所進行的實地訪談中。在現有的死亡焦慮的相關量表內涵中，RCLS 中的「他人的死亡」層面即有所提及，而 MFODS 也以有一個分量表來處理此一層面。

最後，在訪談過程中，研究者發現了大學生對於死亡的另外一個焦慮內涵，即對死亡後的「屍體及其處理」方面的擔心，有關這方面，受訪者的相關回答包括了：

「我希望我死了以後用火化的方式來處理，放在棺材裡還滿可怕的，當然用火燒也是可怕，但是畢竟是一下子而已，在棺材裡要好久好久……，如果那時候還有知覺，那就完蛋了……」(C, 96-99)

「應該是意外死亡吧，如果我現在會死的話，這個年紀生重病不太可能，除非是癌症，……，意外死亡的屍體都還蠻難看的，當然我也不希望這樣死呀，但是這很難說，對吧？」(F, 42-46)

「有時候家屬或警察會要求要驗屍，把屍體剖開來檢查，我覺得人都死了還被這樣對待實在不太好，但是案情有需要時也沒辦法，……，死了雖然沒有感覺了，但如果能安詳一點還是比較好，比較好看……」(J, 77-82)

此部分在性質上較接近有關「屍體」的焦慮內涵，此種關於屍體及屍體處理的焦慮，包括了大學生對於死亡時屍體慘不忍睹的情況，以及死後屍體腐爛、屍體火化的擔心。傳統文化觀點中有所謂「全屍」的觀念，例如，坊間常用的「五福臨門」這句成語，其內涵就包括了「長壽」、「富貴」、「康寧」、「好德」、「善終」五種福報，而其中的「善終」，就是希望死亡時能保有全屍、安祥的離開。這種對於屍體及屍體處理的焦慮，在現有的死亡焦慮的相關量表內涵中，RDAS 與 MFODS 也有相關的題目處理此一問題。

基於上述，大學生的死亡焦慮內涵的架構主要可以分成「自我的喪失」、「未知」、「無助與疼痛」、「來生與審判」、「關係的喪失」、與「屍體及其處理」等六大層面，經與相關的死亡焦慮量表進行比較討論後，可以發現此六大層面的架構與相關量表的構面互有含屬，卻不盡相同，大致包含了死亡焦慮相關量表的重要層面，例如，相較之下，在對國內大學生的訪談中，並未歸納出如 MFODS 量表中有關對「誤判死亡(未死卻被判定為已死)」

的焦慮；而 DAI 量表中所著重的思索死亡與生命的存在性問題（包含了 3 個分量表），在上述的訪談中雖也有提及，但表達上並不強烈；而 MFODS 量表中的「屍體處理」的問題，雖也見諸國內大學生的訪談之中，卻也衍生出大學生擔心死亡時屍體殘破難看的問題，這在相關量表中則未提及，這是否受到國內某些媒體傾向將血腥畫面直接刊（播）出的情況有關，則有待進一步瞭解。

本研究就上述的架構發展死亡焦慮量表的題項，除了就訪談的實際內容為依據來編擬題目之外，也參考了死亡焦慮相關量表的內涵，發展出死亡焦慮的題項共 60 題（每一層面 10 題），在確認各層面均有適量的題項之後，進行相關學者專家效度的檢核，並根據其意見增刪並修訂題項，最後形成預試量表共 62 個題項，在預試及項目分析後刪除 7 題，形成本研究之正式量表共 55 個題項。

二、死亡焦慮量表的信效度評估

（一）信度評估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同時採取可以表現出量表內部一致性與穩定性的 Cronbach α 係數與重測信度，作為正式量表信度考驗的方式。在內部一致性方面，根據正式有效樣本 511 人的施測結果，各分量表的 α 係數介於 .896 至 .937 之間，總量表的 α 係數則為 .964，可知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頗佳。

在穩定性方面，本研究選取嘉義地區二所大學（公、私立各一所）90 名學生，進行間隔一週的重測，各分量表的重測信度介於 .750 至 .880 之間，總量表的重測信度則為 .880，均達 .001 的顯著水準，顯示本量表的穩定性亦佳。綜言之，本研究發展之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

表一 量表信度分析摘要表

因素名稱	題號	（題數）	α 係數	重測信度
自我的喪失	1-9	（9題）	.908	.880***
未知	10-18	（9題）	.896	.760***
無助與疼痛	19-27	（9題）	.910	.780***
來生與審判	28-37	（10題）	.903	.750***
關係的喪失	38-46	（9題）	.915	.824***
屍體及其處理	47-55	（9題）	.937	.831***
總量表	1-55	（55題）	.964	.880***

*** $p < .001$

(二) 效度評估

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首先，研究者將量表題目進行 KMO 及 Bartlett 球形考驗，得到 KMO 值為 .949，Bartlett 球形考驗的卡方值為 19088.967，達 .001 的顯著水準，顯示樣本取樣適當，適合進行因素分析。在因素的抽取上採主軸法進行；在轉軸方法的選擇上，有鑑於分量表間的關係並非完全獨立，故採取斜交轉軸方式進行，結果共抽取六個因素。由表二的摘要表觀之，所抽取的 6 個因素可解釋的部分佔總量表總變異的 62.295%。在題項的因素歸屬方面，各題項均能歸納至所屬的分量表中，顯示就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而言，本量表的建構效度頗佳。

表二 量表因素分析摘要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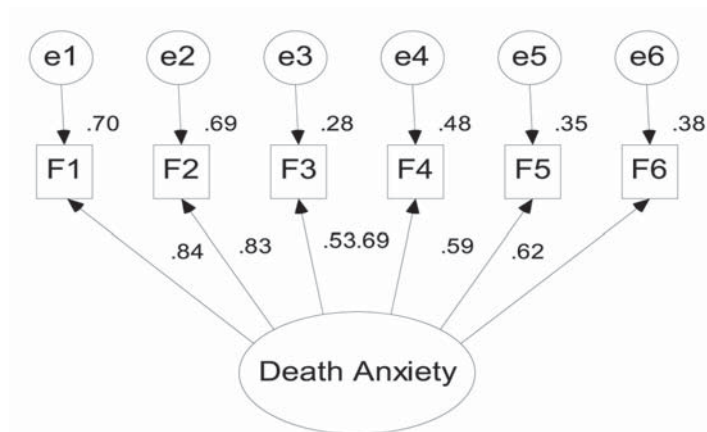
因素名稱	特徵值 (轉軸後)	負荷量	解釋變異量 %
自我的喪失	9.554	1. 我會擔心英年早逝	3.218
		2. 我會擔心死後就什麼都不存在了	
		3. 我會擔心在我死之前來不及完成我的目標	
		4. 我會擔心我會夭折，無法去享受人生的娛樂	
		5. 我會擔心死亡會讓我沒有時間去做所有我想要做的事情	
		6. 我不能接受當大家都還活著，而我卻要死了的情況	
		7. 我擔心死神會突然造訪，讓我來不及思考我的人生	
		8. 我會擔心死亡無預警地發生，我就這麼突然的消失不見了	
		9. 死亡就是關於生命所有事物的結束，我會覺得遺憾	
未知	10.199	10. 我會擔心我死後就沒有任何的知覺	33.733
		11. 對於死亡的一無所知讓我感到困擾	
		12. 如果能知道死亡以後的實際情況，會讓我放心一點	
		13. 我不知道死亡是什麼感覺，所以我會擔心死亡的到來	
		14. 沒有人可以確認死後會發生什麼事情，這讓我對死亡感到焦慮	
		15. 對於各種宗教對死後的描述，我很困惑，不知道該不該相信	
		16. 如果能夠讓我知道死亡的實際感受，我就比較不會擔心死亡	
		17. 我會因為對死亡的未知而感到焦慮	
		18. 我很擔心死後究竟會遭遇什麼事	

表二 (續)

	47. 想到我的屍體會腐爛，讓我感到害怕				
	48. 我會擔心我死後會困在幽閉的棺材中			-.836	
	49. 我害怕我的死狀淒慘，屍體很難看			-.848	
	50. 我會擔心我死後屍體被解剖			-.780	
屍體 及其 處理	51. 我擔心自己的屍體在墳墓中腐爛分解的情況			-.860	
	52. 我會擔心自己死亡時屍體支離破碎的情況	11.097		-.877	5.294
	53. 我會很在意我死後是由誰來處理我的屍體的 問題			-.824	
	54. 我會擔心我死後屍體被推進火化爐的情景			-.876	
	55. 除了至親之外，我不希望別人看到我死後的 樣子			-.623	
			累積 總變 異量	62.295	

2. 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驗證上述探索性因素分析所抽取的六大層面之結構模式是否獲得實證資料支持，因此，進一步以本量表六大層面的分數作為觀察變項，運用 Amos 統計軟體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如圖一及表三所示：



F1：自我的喪失

F2：未知

F3：無助與疼痛

F4：來生與審判

F5：關係的喪失

F6：屍體及其處理

圖一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構圖

首先，在基本適配指標方面，因素的變異數及誤差項的變異數均未出現負值的不合理數據，且皆達顯著水準；因素負荷量介於 .53 至 .84 之間，顯示其基本配適情況適切。在整體適配指標方面，除 χ^2/df 為 3.57，*RMSEA* 為 .105 未達整體適配的標準之外，其他指標諸如 *CFI*、*TLI*、*GFI*、*RMR*、*NFI*、*IFI* 等，均達整體適配的標準，顯示本量表六大層面模式上屬良好配適。在模式內在品質方面，個別項目的信度皆在 .25 以上，標準化殘差的絕對值均小於 1.96，顯示其模式內在品質亦佳。

表三 驗證性因素分析整體適配結果摘要表

指標	χ^2/df	<i>RMR</i>	<i>GFI</i>	<i>NFI</i>	<i>RFI</i>	<i>IFI</i>	<i>TLI</i>	<i>CFI</i>	<i>RMSEA</i>
檢定結果	3.57	.037	.953	.941	.902	.957	.927	.956	.105
標準	< 3.0	< .05	> .90	> .90	> .90	> .90	> .90	> .90	< .08

*** $p < .001$

三、大學生死亡焦慮現況與性別差異

根據本研究正式樣本 ($N = 511$) 的調查結果，大學生死亡焦慮的現況如表四所示，由單題平均數及相依樣本 ANOVA 考驗結果觀之，整體而言，大學生對於死亡造成的關係喪失、以及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最感到焦慮（在 Likert 五點量表的單題平均數高於 4 分），對於死後世界的未知、來生與審判、屍體及其處理三方面則明顯地偏低。至於對於死亡所造成自我的喪失的威脅之單題平均數則約略落在五點量表的中點（3 分）左右。

表四 大學生死亡焦慮現況及相依樣本 ANOVA 摘要表

分量表	題數	平均數	標準差	單題平均 (5點量表)	95% 下界	信賴區間 上界	<i>F</i> 值	事後比較
1. 自我的喪失	9	27.32	8.35	3.04	2.964	3.127		5, 3 > 1 > 2; 4 > 6
2. 未知	9	24.35	8.31	2.71	2.616	2.780		
3. 無助與疼痛	9	36.13	7.18	4.01	3.960	4.102	551.14***	
4. 來生與審判	10	26.83	8.69	2.68	2.610	2.764		
5. 關係喪失	9	36.50	7.63	4.06	3.986	4.138		
6. 屍體及其處理	9	22.90	9.04	2.54	2.447	2.627		
整體	55	174.23	36.44	3.16	3.108	3.227		

至於在大學生死亡焦慮性別差異方面，由表五的 *t* 考驗摘要表可以得知，女性大學生在「無助與疼痛」、「來生與審判」、「關係的喪失」、及「屍體及其處理」四個分量表以及死亡焦慮總分等五項分數均顯著地高於男性大學生。顯示相對於男性大學生而言，女性大學生對於死亡造成的關係喪失、以及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較感到焦慮，而男性大學生則對於來生與審判、屍體及其處理兩方面比女性大學生較不焦慮。至於死亡焦慮總分方面，仍顯示出女性大學生高於男性大學生的趨勢。

表五 大學生死亡焦慮性別差異 *t* 考驗摘要表

	性別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i>t</i>	<i>p</i>
自我的喪失	男	181	2.96	1.01	-1.53	.126
	女	325	3.09	.87		
未知	男	182	2.63	.95	-1.32	.187
	女	320	2.75	.90		
無助與疼痛	男	183	3.92	.88	-2.00	.046
	女	326	4.07	.74		
來生與審判	男	182	2.58	.89	-2.13	.034
	女	322	2.75	.84		
關係喪失	男	179	3.88	.94	-3.40	.001
	女	316	4.16	.77		
屍體及其 處理	男	184	2.37	.98	-3.01	.003
	女	325	2.65	.99		
整體死亡 焦慮	男	172	3.05	.71	-3.04	.002
	女	306	3.24	.63		

肆、討論與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於以國內大學生為對象，透過實地訪談的方式，建構其死亡焦慮的內涵及構念，藉以發展出適用於我國大學生的死亡焦慮量表，並以此工具對國內大學生進行調查，以瞭解我國大學生死亡焦慮的初步現況。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針對 10 位大學生進行實地訪談，並分別以 181 位、511 位及 90 位大學生為預試、正式及重測對象進行施測，以下就所獲得之結果進行綜合討論，並提出本研究的結論及建議。

一、綜合討論

就本研究實地訪談的結果觀之，受訪大學生對於死亡一事，表現出的焦慮包括了「自我的喪失」、「未知」、「無助與疼痛」、「來生與審判」、「關係的喪失」、及「屍體及其處理」等六個面向，其焦慮內涵的傳統文化觀點與心理學解釋、以及與相關量表內涵的比較，於前文中已有所討論，在此不再贅述。至於將訪談結果落實為題項，並進一步由專家檢核、預試後進行項目分析、刪題、並於正式施測後進行信度、探索性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的標準化過程及其檢驗結果，則顯示出此份本土化死亡焦慮量表，在以大學生為使用對象時，有頗佳的信度表現，其建構效度也顯示分量表與訪談及理論架構能有相當程度的契合，能展現出死亡焦慮理論基礎及實地訪談結果的重要內涵，因此，應能適用於國內大專學生死亡焦慮的相關研究。

在本節綜合討論中，研究者所欲進一步加以探討的主要針對以此量表對國內 511 位大學生所進行的調查結果進行討論。首先，就表四所呈現的大學生死亡焦慮現況，根據其平均分數及事後比較的結果來看，大學生對於死亡造成的「關係喪失」、以及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感到較高程度的焦慮（五點量表的題平均數高於 4 分），對於死後世界的「未知」、「來生與審判」、以及「屍體及其處理」則明顯地較不感到擔心。

在相關的實證研究中，Holcomb、Neimeyer 與 Moore（1993）以 952 位成人樣本為對象所做的調查，在 MFODS 量表的八項分量表得分，亦以「瀕死過程」及「重要他人死亡」二項相對較高，就此部分而言，本研究結果與其堪稱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的「關係喪失」層面，指的是受試者自己的死亡造成與親友間的聯繫中斷，而 MFODS 量表中的「重要他人死亡」，指的則是受試者擔心其重要他人的死亡。因此，就死亡所造成的關係喪失方面，二者固有其重疊之處，但如就死亡的主體而言（究竟是自己的死亡或他人的死亡），二者實有很大的不同，從本研究受試者在「自我的喪失」層面的得分（3.04）來看，「關係喪失」層面的得分（4.06，為六個層面中最高者）所展現的，應為其對於死亡所造成

的與重要他人關係的喪失而言，至於死亡的主體為自己或他人是否會影響受試者對於關係喪失的焦慮，本研究尚未能就此提出有效的論證，有待未來進一步的探究。在其他可比較的範圍內（MFODS 中並未有關於「來生與審判」的題項及層面，因此無法就此層面進行比較），上述 Holcomb 等人（1993）的研究發現受試者對「對誤判死亡（未死卻被判定為已死）的恐懼」、「對死後屍體腐爛的恐懼」相對較低，此情況亦與本研究所發現的對「屍體及其處理」焦慮較低的情況相符。

另外，在以國內大學生為對象的來生信念調查研究中（蔡明昌、歐慧敏，2008），發現國內大學生對於來生信念中的「決定機制」層次，以相信因果報應的層面得分最高，而且顯著高於審判、救贖等層面的分數，此一結果對照於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於「來生與審判」所產生的死亡焦慮相對偏低的情況，亦有相呼應之處，研究者認為，國內大學生偏向相信來生的境遇受到傳統因果報應的機制所調節，傳統的業報觀強調「業」係由己身所結，亦可由自身所解，此種偏向自力宗教的來生觀與屬於他力宗教的審判信念並不完全一致，在實地訪談中，亦有受訪大學生強調可以「多做好事」來避免死後下地獄的觀點，可以符應上述這種操之在己而非受制於人的情況，也可以視為本研究發現大學生對於「來生與審判」所產生的死亡焦慮相對偏低的可能原因。

綜合上述，受試大學生對於死亡過程中可能遭受的苦痛是頗為在意與擔心的，對於因為死亡的發生而與重要他人間的聯繫斷絕，也表現出相當程度的焦慮。對此，研究者認為，相對於「自我的喪失」、「未知」及「來生與審判」而言，「關係喪失」及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是死亡所造成的情況中，較為具體且直接的，因而較可能造成大學生的擔憂，在前述的實地訪談內容中，也可以發現受訪者對此二層面表達焦慮情緒的反應較為強烈且直接。從「狀態-特質焦慮（state-trait anxiety）」的概念來看（Spielberger, 1966），研究者推測上述的焦慮應屬於一種特殊情境及刺激下所感受到的暫時性的情緒狀態，其焦慮的對象或事件較為特定或明確，較接近狀態焦慮（state anxiety）所界定的範圍，惟此推測的正確性仍有待後續研究加以探討。至於其他諸如死後還有沒有意識或知覺？會不會受到審判？遺體會受到怎樣的對待？就生活經驗來看，是距一般大學生較為遙遠的，甚至在主張死後「神形俱滅」的神滅論者眼中，上述的這些問題根本不存在或無須擔心，因此，受試大學生對於此類题目的焦慮情緒自我陳述，相對而言表現出較低的死亡焦慮分數。

在死亡焦慮的性別差異方面，Neimeryer（1988）在回顧死亡焦慮的研究文獻後指出，死亡焦慮的性別差異的研究結果相當一致，一般而言，女性有較高的死亡焦慮，其中在以大學生為對象的許多研究中，皆發現女大學生有較高的死焦慮。據此，死亡焦慮測量工具的發展過程中，性別差異是一項頗值得探討的背景變項，亦有助於藉此檢驗量表的建構效

度，故本研究亦針對死亡焦慮的性別差異進行討論。就表五所呈現差異考驗結果來看，女性大學生在死亡焦慮總分方面顯著地高於男性大學生，在以青年人為研究對象的相關研究中，從較早期的研究結果（Neimeyer, Bagley, & Moore, 1986; Neimeyer & Moore, 1994; Templer & Ruff, 1971）到晚近的研究發現（Pierce, Cohen, Chambers, & Meade, 2007; Ens & Bond, 2007），皆有女性的死亡焦慮較男性為高的傾向，本研究結果與上述之相關實證研究結果相符。

大部分相關研究結果均指出男女受試者在死亡焦慮自陳量表中的得分有顯著差異，Harrawood、White 與 Benshoff（2008）在回顧過去死亡焦慮的性別差異的研究文獻之後，提出了女性較男性更容易表達其情緒的觀點來解釋此一情況。研究者認為，從社會期待的角度配合上述觀點來看，基於社會普遍對於男性應表現出勇敢堅忍的特質之傳統期待，可能使其較不願表現包括死亡焦慮在內的焦慮情緒，相反的，認為女性較為膽小、柔弱的性別刻板印象，使其在表達其焦慮情緒時顯得較為自在，因而在死亡焦慮自陳量表上的表現有較高的分數。蔡明昌（2014）以大學生為對象進行死亡焦慮的 Stroop 干擾效應之研究，發現了女性大學生在死亡焦慮自陳量表的得分顯著高於男性，但在男性大學生對於死亡相關詞彙的反應時間上卻顯著地慢於女性大學生。顯示在意識層面所能覺知的外顯（explicit）測量情況下，女性的死亡焦慮確有高於男性的趨勢，然而，一旦轉為內隱（implicit）測量的情況，則結果則可能會有所不同，這也呼應了上述由社會期待的角度來解釋死亡焦慮的性別差異之觀點。究竟死亡焦慮的性別差異真相為何？自陳量表式的外顯測量與內隱測量方式所測得的結果之差異，是否僅是社會期許反應（social desirable responding）影響下的結果？抑或是分屬兩種不同建構下的死亡焦慮？則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加以釐清。

當然，上述死亡焦慮性別差異的另一種可能性是，整體而言，女性確實有較男性為高的死亡焦慮，Mellanby 與 Zimdars 於 2011 年所發表的一篇研究指出，其針對牛津大學的 1,929 位申請者所做的調查中，發現女性較男性有顯著較高的特質性焦慮，在對同一樣本中的 635 人進行四年後的追蹤調查時，發現此情況依舊。據此，研究者認為，特質焦慮是一種內在穩定性的人格特質，在這種容易產生焦慮情緒的特質下，相對地容易對特殊的情境或刺激（諸如本研究死亡焦慮量表的題目）產生情緒反應，上述相關研究中女性較高的特質焦慮情況，可能是其表現出較高死亡焦慮的可能因素，然而，國內的大學生是否如上述的英國大學生樣本一樣，有女性較高特質焦慮的情況，亦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來加以確認。

二、結論與建議

(一) 大學生的死亡焦慮內涵的架構主要可以分成六大層面

根據本研究針對 10 位大學生進行實地訪談的結果，配合相關心理學理論基礎、傳統文化觀點、以及死亡焦慮相關量表的內涵之探討，歸納出我國大學生死亡焦慮內涵的架構主要包括了「自我的喪失」、「未知」、「無助與疼痛」、「來生與審判」、「關係的喪失」、及「屍體及其處理」等六大層面，經與國外死亡焦慮相關量表進行比較討論後，發現此六大層面的架構與相關量表的構面互有含屬，卻不盡相同，大致包含死亡焦慮相關量表的重要層面，但並未發現「誤判死亡」的焦慮，而關於死亡時屍體殘破難看的問題，則未在其他相關量表中發現。

(二) 本研究所發展的「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具有的信、效度均佳，皆在可接受之範圍

在信度方面，「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各分量表的 α 係數介於 .896 至 .937 之間，總量表的 α 係數則為 .964；在間隔一週的重測信度方面，各分量表介於 .750 至 .880 之間，總量表的重測信度則為 .880，顯示本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及穩定性均佳。在效度方面，探索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所抽取的六個因素可解釋的部分佔總量表總變異的 62.295%，且能符合實地訪談所歸納的死亡焦慮六大層面架構，各題項亦均能歸納至所屬的分量表中；在驗證性因素分析方面，從相關指標數值加以判斷，亦可知本量表架構的基本適配、整體適配、以及模式內在品質均佳，顯示本研究所發展的「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具有的信、效度均佳。

(三) 國內大學生的死亡焦慮在整體表現上為中等程度，但在分量表上則對死亡造成的關係喪失、以及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感到相當程度的焦慮

本研究調查發現，受試者在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總分單題平均數為 3.16，可見國內大學生的死亡焦慮在整體表現上為中等程度，在分量表方面，大學生對於死亡造成的關係喪失、以及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最感到焦慮；對於死亡所造成自我的喪失的焦慮程度為中等；對於死後世界的未知、來生與審判、與屍體及其處理則明顯地偏低。此結果可由「狀態-特質焦慮」的概念來加以解釋，大學生之所以對死亡造成的關係喪失、以及死亡過程的無助與疼痛較感焦慮之可能原因，在於這兩項分量表的陳述焦慮對象較為特定明確且具體直接所致。

(四) 國內大學生的死亡焦慮具有性別差異，女性較男性有更高程度的死亡焦慮之趨勢

在大學生死亡焦慮性別差異方面，本研究發現女性大學生在大學生死亡焦慮量表總分

上顯著高於男性大學生，在「無助與疼痛」、「來生與審判」、「關係的喪失」、及「屍體及其處理」四個分量表亦有女性大學生顯著較高的情況，此與相關實證研究結果頗為相符。此結果可由在社會期待的影響下，女性較男性更容易表達其情緒的觀點來解釋，亦可由相關研究中發現女性大學生有較高的特質焦慮情況，因而對特殊的情境或刺激較容易產生焦慮情緒反應來解釋之，但實際的真正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

（五）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1. 注意社會期待或防衛機轉所造成死亡焦慮自陳式紙筆測驗的效度問題

本研究所發展及使用的測量工具為自陳式的死亡焦慮量表，此種量表雖然在學術研究上使用廣泛，但需要建立在受試者誠實坦白的前提下，本研究發現國內大學生的死亡焦慮具有性別差異，但此差異很可能是受社會期待的影響所致，過程中即使受試者無意欺瞞，卻可能在不自覺情況下表達出符合社會期待的態度。因此，本研究建議未來的後續研究可以本研究所發展出的死亡焦慮六大層面架構為基礎，繼續發展出可以處理社會期待或防衛機轉所造成測驗效度問題的研究工具，諸如內隱聯結測驗（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情緒性史楚普作業（Emotional Stroop Task），或使用社會期許反應（Social Desirable Responding, SDR）效度量尺等方式來進行處理，應有助於死亡焦慮測量的準確度，也有助於解釋死亡焦慮的性別差異問題。當前國內雖有相關研究進行了初步的探討（蔡明昌，2014），但由於其使用的自陳量表為 Hoelter(1979)的多層面死亡恐懼量表(MFODS)，在內涵上不易有效反應出國內大學生的死亡焦慮現況，因此，未來如果能以本研究所發展出的死亡焦慮六大層面架構為基礎，發展死亡焦慮的威脅性詞彙以建構死亡焦慮 Stroop 作業的內涵，應更能有效探討死亡焦慮的內隱及外顯測量差異問題，進一步更完整地理解死亡焦慮的構念。

2. 透過「狀態 - 特質焦慮」的理論模式來處理死亡焦慮的問題

長久以來，對於死亡焦慮的測量大都以自陳式的紙筆測驗為主，對於死亡焦慮概念的處理上，大多以總分的多寡來表示死亡焦慮的高低，或將各層面的得分加以報導。然而，在研究者針對本研究的結果所進行的探討過程中，由「狀態 - 特質焦慮」的理論模式得到了若干的啟發，認為從此理論來看，焦慮是一個頗為複雜的概念，而焦慮情緒的測量工具，也不應該只是一項表達焦慮與否的高低總分而已。因此，研究者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在進行死亡焦慮的測量時，配合「狀態 - 特質焦慮量表」(State Trait Anxiety Inventory, STAI) 的使用，進一步釐清死亡焦慮與個體的狀態性焦慮及特質性焦慮間的關係。

3. 繼續以多元方法檢視本土化死亡焦慮量表之效度與內涵

本研究雖然在經過相關文獻探討、實地訪談及實證研究後發展出死亡焦慮量表，但這並不代表本土化死亡焦慮量表建構工作的完成，尤其研究者自省認為本研究在嚴謹性上仍未臻完美，需要後續研究持續以多元方法繼續檢視量表的效度與內涵。首先，在效度方面，後續研究可以進一步以多特質 - 多方法 (Multitrait-Multimethod, MTMM) 的方式，進行區辨效度與幅合效度的檢視，並擴大樣本的規模，進行量表效度複核的驗證。在內涵方面，由於本研究在實地訪談的抽樣策略上僅考量其宗教信仰與性別二因素，可能因同質性太高而致使訪談者提供資料容易飽合重複，而未能深究其死亡焦慮之內涵，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進一步考量受訪者的家庭、瀕死經驗與教育背景等與死亡焦慮有關的因素加以選取樣本，如此應有助於獲得更為多元豐富的資訊，藉以豐富本土化死亡焦慮量表之內涵。

參考文獻

- 吳美如 (2005)：生死教育課程對高職學生生命價值觀及死亡焦慮影響之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 宋文里、李亦園 (1988)：個人宗教性：台灣地區宗教信仰的另一種觀察。清華學報，18 (1)，113-139。
- 宋光宇 (1983)：中國地獄罪報觀念的形成。省立博物館科學年刊，26，1-36。
- 段德智 (1994)：死亡哲學。台北：洪葉文化。
- 許惠淳 (2002)：不同依附型態之醫學院學生與非醫學院學生在死亡焦慮及害怕個人死亡歸因上之差異。國立成功大學行為醫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南市。
- 傅偉勳 (1993)：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從臨終精神醫學到現代生死學。台北：正中書局。
- 黃宇達 (1997)：死亡焦慮：性別、年齡與死亡焦慮歸因之角色的探討。中原大學心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桃園。
- 楊小薇 (2009)：大學生死亡焦慮之研究：情緒性叫色作業取向。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 楊曉惠 (2010)：養護機構老人生命意義感與死亡焦慮相關性之研究—以高高屏地區為例。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 劉益廷 (2011)：嘉義地區國小六年級學生情緒智力與死亡焦慮關係之研究。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嘉義。

- 潘富恩 (1996)：范縝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蔡明昌 (2007)：我國大學生來生信念初探。中華心理衛生學刊，20(3)，235-260。
- 蔡明昌、歐慧敏 (2008)：本土化大學生來生信念量表的建構與發展。生死學研究，7，7-88。
- 蔡明昌 (2014)：大學生在死亡相關詞彙的史楚普干擾效應之前導性研究。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38，91-115。
- 釋慧開 (2004)：儒佛生死學與哲學論文集。台北：洪葉文化。
- Becker, E. (1973). *The denial of death*.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Cross, R. W., & Huberty, J. J. (1993).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 for children with a sample of seventh-and eighth-grade students. *Journal of Psycho Educational Assessment, 11*, 232- 241.
- Endler, N. S., & Kocovski, N. L. (2001). State and trait anxiety revisited. *Anxiety Disorders, 15*, 231-245.
- Endler, N. S., Parker, J. D., Bagby, R. M., & Cox, B. J. (1991). Multidimensionality of state and trait anxiety: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Endler Multidimensional Anxiety Scal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0*, 919-926.
- Ens, C., & Bond, J. B. (2007). Death anxiety in adolescents: The contributions of bereavement and religiosity. *Omega, 55*(3), 169-184.
- Feifel, H. (1965). *The meaning of death*.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Gesser, G., Wong, P. T., & Reker, G. T. (1987). Death attitudes across the life-span: Th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Death Attitude Profile (DAP). *Omega, 18*, 113-128.
- Harrawood, L. K., White, L. J., & Benschoff, J. J. (2008). Death anxiety in a national sample of United States funeral director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death exposure, age, and sex. *Omega: Journal of Death & Dying, 58*(2), 129-146.
- Hoelter, J. W. (1979). Multidimensional treatment of fear of death.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7*, 795-800.
- Holcomb, L. E., Neimeyer, R. A., & Moore M. K. (1993). Personal meaning of death: A content analysis of free-response narratives. *Death Studies, 17*, 299-318.
- Kelly, G. A. (1955).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 New York, NY: Norton.
- Knott, J. E. (1979). Death education for all. In H. Wass, (Ed.), *Dying: Facing the facts* (pp. 385-403).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 Lester, D. (1994). The Collett-Lester Fear of Death Scale. In R. A. Neimeyer (Ed.), *Death anxiety*

- handbook: Research, instru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pp. 45-60).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 Leviton, D. (1977). The scope of death education. *Death Education, 1*, 41-56.
- Maslow, A. H. (1968).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2nd ed.). New York, NY: Van Nostrand Reinhold.
- Mellanby, J. & Zimdars, A. (2011). Trait anxiety and final degree performance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High Educ, 61*, 357-370
- Morgan, J. D. (1997). Death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J. D. Morgan (Ed.), *Readings in thanatology* (pp. 1-6). New York, NY: Baywood Publishing Company, Inc.
- Neimeryer, R. A. (1988). Death anxiety. In H. Wass, F. M. Berardo, & R. A. Neimeryer (Eds.), *Dying: Facing the facts* (2nd ed., pp. 97-136). Washington, DC: Hemisphere.
- Neimeyer, R. A., & Moore, M. K. (1994).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fear of death scale. In R. A. Neimeyer (Ed.), *Death anxiety handbook: Research, instru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pp. 103-119).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 Neimeyer, R. A., Bagley, K. J., & Moore, M. K. (1986). Cognitive structure and death anxiety. *Death Studies, 10*, 273-288.
- Pett, M. A., Lackey, N. R., & Sullivan, J. J. (2003). *Making sense of factor analysis in health care research: a practical guide*. London: Sage.
- Pierce, J. D., Cohen, A. B., Chambers, J. A., & Meade, R. M. (2007). Gender differences in death anxiety and religious orientation among US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students. *Mental Health, Religion & Culture, 10*(2), 143-150.
- Rogers, C. R. (1959). A theory of therapy, personality,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s developed in the client-centered framework. In S. Koch (Ed.), *Psychology: A study of a science* (vol. 3, pp. 184-256). New York, NY: McGraw-Hill.
- Rogers, C. R. (1980). *A way of being*. Boston, MA: Houghton-Mifflin.
- Spielberger, C. D. (1966). *Anxiety and behavior*. New York, NY: Academic Press.
- Stevens, J. (2002).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4th ed.).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Taylor, S., & Brown, J. D. (1988). Illusions and well-being: A social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ental heal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03*, 193-210.
- Templer, D. I. (1970). The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Death Anxiety Scale. *Journal of General Psychology, 82*, 165-177.

- Templer, D. I., & Ruff, C. F. (1971). Death Anxiety Scale means, standard deviations, and embedding. *Psychological Reports, 29*, 173-174.
- Thorson, J. A., & Powell, F. C. (1994). A Revised Death Anxiety Scale. In R. A. Neimeyer (Ed.), *Death anxiety handbook: Research, instru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pp. 31-43).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 Tomás-Sábado, J. & Gómez-Benito, J. (2005).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the Death Anxiety Inventory (DAI).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21*(2), 108-114.
- Tomás-Sábado, J., Gómez-Benito, J., & Limonero, J. T. (2005). The Death Anxiety Inventory: A revision. *Psychological Reports, 97*(3), 793-796.
- Tomer, A. (1994). Death anxiety in adult life. In R. A. Neimeyer (Ed.), *Death anxiety handbook: Research, instru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pp. 3-28).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 Wass, H. (2004). A perspective on the current state of death education. *Death Studies, 28*, 289-308.
- Wong, P. T., Reker, G. T., & Gesser, G. (1994). Death Attitude Profile-Revised: A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 of attitudes toward death. In R. A. Neimeyer (Ed.), *Death anxiety handbook: Research, instru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pp. 121-148). Washington DC: Taylor & Francis.

收件日期：102年04月08日

複審一日期：102年09月09日

複審二日期：102年11月17日

複審三日期：103年01月03日

通過日期：103年04月06日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Survey of Death Anxiety amo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Ming-Chang Tsai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Due to the lack of a death anxiety scale that is constructed from the localized viewpoint, this study was designed to explore the contents of death anxiety by interviewing ten undergraduate students. Based on the interview data, the death anxiety scale was developed, and subsequently used to survey the death anxie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Six dimensions of death anxie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 were identified and used to generate items of the 'Death Anxiety Scal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A sample of 511 college students was recrui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death anxiety of undergraduate students in Taiwan was intermediate ($M = 3.16$, five-point Likert response format). However, participants gave higher ratings to the dimensions of "loss of relationship" and "helplessness and suffering". Gender difference was also found with female participants expressing higher death anxiety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Based on the finding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were highlighted.

Keywords: death anxiety, scale, undergraduate student